

文史知识

我学词的经历

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

什么是古诗中的「兴寄」

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

祭灶旧俗漫谈

整理古籍有哪些常用的方法

唐圭璋

漆侠

牟世金

洪廷彦

何游

赵守俨

1985

WENSHI

空军军医学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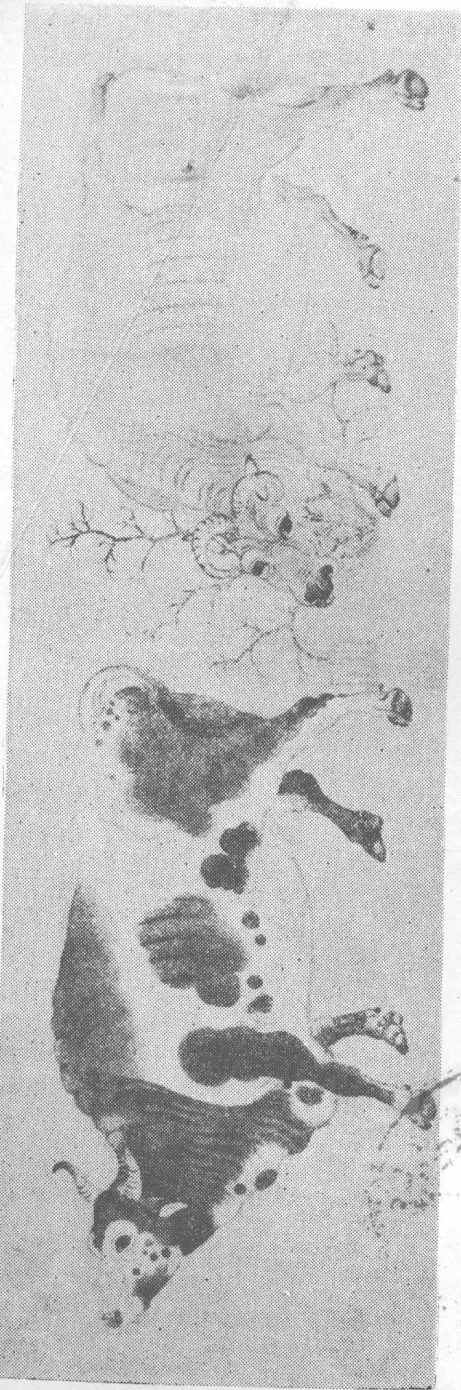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资料

政治教研室

ZHISHI

2





《五牛图》〔唐〕韩滉

（参阅本期《韩滉和〈五牛图〉》一文）



医药学院610 2 01472327

文史知识

1985 年第 2 期

(总第 44 期)

• 治学之道 • 我学词的经历	唐圭璋	3
• 文学史百题 •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(下)	卞孝萱	7
• 历史百题 •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	漆侠	14
• 怎样读 • 北有《西厢》 南有《拜月》 ——谈南戏《拜月亭记》	俞纪东	20
诗 什么是古诗中的“兴寄”(怎样欣赏古典诗词之十八)	牟世金	25
文 思路凄惋 真切动人——读李煜词《浪淘沙令》	正谷	29
欣 檄文典范 骈俪佳品——读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	程郁缀	32
赏 柳暗花明又一村——陆游《游山西村》赏析	曹济平	36
• 词学名词解释(8) • 换头 • 过片 • 么	施蛰存	40
• 文史书目答问 • 中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史专著《明儒学案》	任大援	43
• 文史工具书介绍 • 阅读古代小说的重要工具书《小说词语汇释》	张涌泉	46
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	洪廷彦	50
文化 祭灶旧俗漫谈	何 浔	55
史 《水浒》和宋代法律制度	曾代伟	58
知识 中国佛教四大菩萨	白化文	63
• 古文字学十二讲 • 第五讲 金文的形形色色(上)	李学勤	68
•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(连载十四) • 三国的文职公卿——三国职官之一	孙 钱	72

人物春秋	慷慨悲歌的爱国英雄刘琨	允 中	77
	初唐“四杰之冠”王勃	徐 俊	81
	祸国殃民的投机政客蔡京	吴 泰	86

• 读词讲话 • 论词的章法	吴世昌	91
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• 文体知识 • 骈文的起源和演变	谭家健	9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成语典故	未雨绸缪	辛 志	102
	胯下之辱	陶 慧	102

• 文史信息 •	张家山汉简——西汉典籍的重大发现(57) 敦煌文学研究近况 (104) 《长恨歌》因何而作(104) 大型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将陆续出版 (105) 日本研究宋史之现状 (105) 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不久将成全璧 (106)
----------	--

• 文史信箱 • 整理古籍有哪些常用的方法	赵守俨	10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青年园地	关于薛宝钗形象的讨论	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	113
	宝钗是被作者否定的形象(梁寒)	薛宝钗形象之再认识	
	(武时颖)	宝钗也应该得到同情(张小兰)	作为形象
	的权利——为宝钗辩护(陈君宏)		

书画欣赏	韩滉和《五牛图》	蔡星仪	119
	南铭之冠与北碑之冕 ——梁《瘞鹤铭》、北魏《郑文公碑》	陈玉龙	121

• 文史古迹 • 唐乾陵及其石人群像	陈国灿	12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• 补白 7 则 •	矜功不立,虚顾不至(19) 三旨宰相(35) 柳开千轴,不如张景一书(39) 吕蒙正不记人过(54) 芝麻通鉴(85) 泉鸟迁居(112) 不以私害公(118)
------------	--

封面设计 张守义

《五牛图》(封二) 唐乾陵(封三)

我学词的经历

唐圭璋



唐圭璋，江苏省南京市人，生于1901年，专治词学。解放前曾任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中文系教授。解放后曾任南京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。现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、《词话丛编》等。

我在南京读中学时，只读过一些古典诗文，对词曲虽爱好，但涉猎不多。1922年，我二十二岁，考进了东南大学（后改名中央大学，旧址即现在的南京工学院），开始从吴梅先生学习词曲。

吴先生初开“词学通论”课，讲授词韵、平仄、音律、作法及历代词家概况，使我初步了解到有关词的各方面知识，引起我对词的爱好。接着吴先生开“词选”课，选录历代名著，阐述详尽，更使我在词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最后，吴先生又开了两年“两宋专家词”课，对专家进一步做了深入的研究，这就使我决心踏上治词的路径。

先生教学认真，诲人不倦，要求学生多阅读，多思考，多写作。我在先生的指导之下，首先读熟《词选》中所选的词，次则完成先生在课堂上所布置的词学习作。春秋佳日，星期有暇，先生常率领我们学生游览南京名胜古迹，每到一处，都和我们一起作词谱曲。明故宫、灵谷寺、玄武湖、扫叶楼、豁蒙楼，常有我们师生的足迹。有时我们师生也“夜泊秦淮近酒家”，作访《桃花扇》里“媚香楼”的词曲，尽欢而散。先生家住大石桥，我们学生常到他家里习唱，玉笛悠扬，晚霞辉映，师生唱和，其乐融融。我们都学会了吹笛唱曲，对词曲源流及其关系也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。先生在校时，还建立“潜社”（取“潜心学术”之意）作词，我与同学段熙仲、王季思、张世禄、周世钊、

常任侠等都参加作词作曲，并刻过《潜社词曲汇刊》。

1934年，前辈词家云集南京，吴先生组织“如社”，约廖竹庵、林铁尊、仇述庵、石云轩、陈匪石、乔大壮、汪旭初、蔡嵩云诸先生和我参加，每月集会作词。词调由各人轮流出，词题、词韵不限，但词调以依四声为主，取名家创制为准则，如《倾杯》依柳永“鹭落霜洲”体，《换巢鸾凤》依梅溪四声，《绮寮怨》依清真四声，《水调歌头》依东山四声，《泛清波摘遍》依小山四声，一词作成，虽经苦思，但也有乐趣。犹记我櫟括陶潜《桃花源记》作过一首依东山四声的《水调歌头》：

舟逐古津远，绿树蘸波圆，绀桃红浅。一川相映落英繁，花外云山新换。忽入千家庭院，男妇笑声喧。斟酒初开宴，不计是何年。掩松萝，寻碧藓，乐幽闲。太平鸡犬，浑疑灵境住神仙。归去缤纷两岸，犹记当时人面。啼损隔林鹃。回首溪如练，樵径散风烟。

此词平仄通叶，只有过片三字不叶，其余句句叶韵，可见东山深通音律，能够自设新腔。“如社”刻过《如社词钞》一册，各家亲笔余稿曾在我处，惜后来未刻，都已散失。

1936年，我爱人病故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我将三女孩寄养仪征岳家，只身到成都任教。国难家愁，生离死别，我写了一些小词，辑为《南云小稿》，收入杨公庶《雍园词钞》中。

乱离骨肉散天涯，谁家插得茱萸遍。（《踏莎行》）

今宵独卧中庭冷，万里澄晖照泪悬。（《鹧鸪天》）

明月茫茫，一度登楼一断肠。（《采桑子》）

从这些断句中，可以约略反映出我当时的悲痛心情。1939年，吴梅先生病逝于云南大姚。噩耗传来，我更心伤，曾作《虞美人》悼念。词云：

乱山迷雾姚州路，不道瞿仙去。两年避寇走天涯，白发飘萧，日日望京华。豪情曾击琼壶碎，几度青溪醉。水磨白芷寂无闻，莺老花残，空忆石桥春。

我在学习和后来任教之后，得暇则研究词家的生平事迹，历代词学评论及做宋金元词的辑佚工作。多年来，我编过《纳兰容若词》（此稿原存上海神州国光社，后该社被封闭，稿即散失）、《宋词三百首笺》、

《南唐二主词汇笺》、《词话丛编》、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、《宋词纪事》、《宋词四考》、《校注词苑丛谈》、《唐宋词简释》等书，写过《姜白石评传》、《论梦窗词》、《云谣集杂曲子校释》、《纳兰容若评传》、《评〈人间词话〉》、《论词之作法》等论文。回忆我的治词经历，自启蒙到写作、到校词、辑词、论词，体会甚多：

一是温故知新，由博返约。温故，就是古典文学的基础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几方面的知识，都要懂得一点；知新，指古典文学发展的新形势，如文物出土情况，新发现的资料，各种观点的新文章。由博返约，就是基础知识要厚实，面要宽广，但又不能满足于此，专业还要精深，这样才能有创见、有发明。

二是钩沉表微，贵有恒心。我辑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，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已开始。《全宋词》的编纂起自1931年，分四步进行：（一）综合诸家所刻词集；（二）搜求宋集附词；（三）汇列宋词选集；（四）增补遗佚。旁采笔记小说、金石方志、书画题跋、花木谱录、应酬翰墨及《永乐大典》诸书，统汇为一编。1935年，三次印出《全宋词目录》，分发全国各地，广泛征求意见。并先写成六十家词跋尾，发表在《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》上，后又写成四十种词跋尾，发表在《制言》上，作为准备工作。1937年，全书初稿完成，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。因抗战开始，至1939年出版二十册线装书，计辑两宋词人约一千多家，词二万余首。由于当时条件限制，书中还存在不少缺点。二十年后的1959年，我准备重新修订，但由于当时我患风湿关节炎，不能进行这项工作，由我推荐王仲闻先生为我修订。1965年重印出版。计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，词一千六百余首。最近孔凡礼先生又从清初季沧苇所藏明抄本《诗渊》增补宋词四百多首。《词话丛编》1937年出版，收词话六十种。四十年后又重新修订，增二十五种，共收词话八十五种。

三是师友的切磋支持。我编《全宋词》、《词话丛编》等书，吴梅先生看了极为高兴，都为我作序，期望之殷切，情谊之深厚，我每临风怀想，铭感难忘。《全宋词》初稿完成后，呈汪辟疆先生审阅，汪先生看到我用《彊村丛书》本卢祖皋《蒲江词稿》比毛晋本多七十余首，用明

嘉靖本程秘《洛水集》比毛晋本多三首，用李之仪《姑溪集》比毛晋本多八首，用明沈愚本刘过《龙洲词》比毛晋本多三十四首，用明成化本何梦桂《潜斋先生文集》比《四印斋》本多七首，用明刊吴儆《吴文肃公文集》比江标本多九首，大为高兴，坚持请国立编译馆接受全稿，交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如果当时无汪先生力争，此稿也就早已化为乌有了。同学赵万里、卢冀野、任中敏和词友龙榆生、赵叔雍、夏瞿禅、王仲闻等不弃浅薄，热诚指教，积极帮助，亲切鼓励，也是可感可敬，不能忘情的。1931年，万里出版了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，精审突过前贤。但他最少需三首才辑为一卷，启发我立有将宋金元词统汇为一编之志，所有一首、二首，甚至断句都加以校辑。万里借我影宋本《梅苑》参考，并给我《截江网》、《翰墨大全》、《永乐大典》中词，皆它处所未见。我辑《词话丛编》、《全宋词》时，冀野曾为我多方搜集资料，鼓励我奋勇前进。中敏知我辑《全宋词》，便将他个人所藏诸家词集全部送我，我至今不忘。书出之后，他又通阅一遍，指出错误。他最近拟撰唐艺探微八种，为祖国争光，雄心壮志，不减往昔。榆生从疆村老人治词，主编过《词学季刊》，我和他经常通信论词，对我编《全宋词》积极帮助。他的学生周咏先作《宋金元词钩沉》，朱居易作《六十家词勘误》，对我校辑宋词都有很大帮助。瞿禅自学功深，心仪已久，我辑《全宋词》时，陆游《剑南诗稿》中有《渔歌子》五首，《平阳县志》中有石刻宋词，都是他告诉我的。叔雍为况蕙风先生高足，他在宁时，曾为我撰《南唐二主词汇笺》序，并借给我《清初百名家词》过录，我们相约，他见宋词给我，我见明词给他，共同治词，相互研讨。仲闻为静安先生次子，家学渊源。我辑《全宋词》，曾先将目录分发全国各地，广泛征求意见，他提出很多宝贵意见，并把自己所作的宋词长编借给我参考。他为我重新修订《全宋词》，六年辛勤，全力以赴。十年动乱中，他被迫害致死，痛心已极。以上就我回忆所及，略述我的良师益友对我治词的帮助，没有他们我是不能完成这一部《全宋词》的。

当前，古籍新资料层出不穷，令人欢欣鼓舞。欧美日本也竞研汉学，不遗余力，我国老中青同志更应该结合起来，为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刻苦钻研，攀登高峰。

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(下)

卞孝萱

三

新乐府运动是诸多诗人共同努力而形成的，象李绅、元稹、张籍、王建等，都是积极的参加者，他们在这一诗坛活动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李绅先作“乐府新题二十首”，已佚。元稹赞扬李诗“雅有所谓，不虚为文”（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》序），可见李诗与白居易“篇篇无空文，句句必尽规”（《寄唐生》）的精神是一致的。

元稹作“新题乐府十二首”，在李绅之后，白居易之前。元稹撰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（并序）》，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，正式提出尊杜观点，也在白居易写《与元九书》之前。在理论上和创作上，元稹给白居易以不小的启发，但元的成就却不如白。

将元的“新题乐府”十二首与白的《新乐府》五十首作一比较，可以发现二者在选材、命意、表现手法等方面各有特色，而元不如白之处是：（一）元诗十二首，前后排列，无条理可言；白诗五十首，有完整的结构，次序明晰。

（二）元诗未采取“首句标其目”和题下有小序的作法，不如白诗一目了然。（三）元诗往往一题包括数义，内容比较庞杂；白诗每首咏一事，持一旨，不杂不复。（四）元诗叙事，有的比较浮泛，不如白诗深刻。元诗用典，有的稍觉迂远，不如白诗贴切。（五）元诗的造句，尚拘守七言古诗形式，不如白诗行文自由。元诗的用字，有时尚嫌晦涩，不如白诗语言流畅，娓娓动人。

张籍（文昌）、王建（仲初）创作乐府诗，在李绅、元、白之前。何世璠《然灯纪闻》说：“元、白、张、王诸作，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

其神者，乃真乐府也。”这是说他们属于一个流派。当然同中有异，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说：“张司业诗，与元、白一律，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，但白才多而意切，张思深而语精，元体轻而词躁尔。”刘熙载《艺概》说：“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、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，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。”张、王二人，虽然齐名，也各有特色。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说：“乐府之所贵者，事与情而已。张籍善言情，王建善征事。”前人这些评论，可供我们参考。

总的来说，张、王乐府诗的成就不如元、白。张、王乐府诗，篇幅比元、白要短，描写不如白居易细腻。张、王擅长以简炼的语言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，往往以一两句话对黑暗现实作出尖锐的讽刺。当时，张、王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名声，都比元、白低，张、王诗歌所起的影响比元、白小，但张、王各以创作参加新乐府运动，增大了运动的声势。

四

白居易在“新乐府”上的成就不仅在其诗友李绅、元稹以及张籍、王建等人之上，其创作对我国诗史也是一个崭新的发展。当然白诗不是、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。

白居易在《新乐府》总序中说：“篇无定句，句无定字，系于意，不系于文。首句标其目，卒章显其志，《诗》三百之义也。”这段话说出了《新乐府》体裁上的特色：（一）他大量运用了三、七言相间杂的句法，参用了五、六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字“杂言”的句法，又采用了叠字法，使《新乐府》写得活泼、多变化，便于表达内容。（二）他继承《诗经》的传统：《毛诗》有大序，《新乐府》有总序。《毛诗》每篇有小序，《新乐府》每首也有小序。《诗经》以每首的首句为题，《新乐府》基本上也是这样。《诗经》大多在每篇末章，阐发题义，《新乐府》也于每首最末几句，揭示全首的主题思想及作者的用意所在。

在白居易之前的唐代诗人中，顾况曾进行过这种写作方法的尝试。请看下面的例子：

顾况《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》	白居易《新乐府》
《上古一章》 小序：“上古，愍农也”。 诗：“遇哉上古，生弃与柱。……”	《七德舞》 小序：“美拨乱，陈王业也。” 诗：“七德舞，七德舞，传自武德至元和。……”

对照之下，可以看出白居易《新乐府》每首有小序以及“首句标其目”这一体制的形成，受到了顾况的启发。

“首句标其目”的好处是开门见山，“卒章显其志”的好处是画龙点睛。都是为了给读者以明朗的印象。但一首诗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，“首句”和“卒章”只是其中的两个组成部分，就拿山、龙来比吧，山不好，开门有什么可看的？龙画得不好，点睛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写作方法。

从思想内容方面看，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，从太宗创业、玄宗失政一直写到宪宗时事，广泛地反映了唐朝一百九十年间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风俗、文艺、少数民族等方面的重大问题。我们读《新乐府》时，要注意到诗中所涉及的问题，由于时间不同，性质有异。例如：在唐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，《新丰折臂翁》所反对的是玄宗后期对南诏的穷兵黩武的战争，而《西凉伎》所谴责的是中唐时期河西、陇右为吐蕃贵族侵占，坐拥重兵的唐将，不图收复，反而欣赏狮子舞。两诗结合起来看，才能全面了解白居易的思想倾向。

《新乐府》贯彻了《诗经》“美刺比兴”的精神。五十首诗，有“美”有“刺”。例如：（一）《道州民》的小序：“美臣遇明主也。”这是纯“美”的一首诗。（二）《两朱阁》的小序：“刺佛寺寝多也。”这是纯“刺”的一首诗。（三）《城盐州》的小序：“美圣谟而消边将也。”这是有“美”有“刺”的一首诗。（四）《七德舞》中“美”太宗将“怨女三千放出宫”的“仁政”，《上阳白发人》中“刺”玄宗使宫女“一生遂向空房宿”的虐政，一个问题的“美”与“刺”，分别见于两首诗中，需要对照起来看。爱憎分明的白居易，灵活地运用了“美”与“刺”的手法。由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统治阶级可“美”的东西不如可“刺”的东西多，所以五十首诗中“刺”所占的比

重很大。白居易不是为讽刺而讽刺，是为了争取实行“仁政”而抨击虐政，为了维护正面事物而揭露反面事物。

前辈诗人作品中的进步的思想内容，对白居易创作《新乐府》是有启发作用的。以顾况《行路难三首》的第三首与白居易《海漫漫》为例，二诗都为反对求仙（即求长生不老）而作。白诗中关于“秦皇汉武”求长生不老而事与愿违的大段描写，乃是顾诗“秦皇汉武遭不脱”一句的发展；白诗以“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：不言药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升青天”为结束，抬出唐朝皇帝所攀认的祖先——老子，以标明祖宗垂戒子孙之意，比顾诗“汝独何人学神仙”的结语，更有说服力。

据白居易自述，“启奏之外，有可以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，而难于指言者，辄咏歌之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，《新乐府》中所“刺”的对象，就有“难于指言”而隐寓其人者。例如：《天可度》的小序：“恶诈人也。”结语：“君不见：李义府之辈笑欣欣，笑中有刀潜杀人？阴阳神变皆可测，不测人间笑是瞋。”“诈人”（即“李义府之辈”）指谁呢？陈寅恪考为李吉甫。我们可以从《新唐书·裴垍传》等史料看出李吉甫是裴垍集团的政敌，而白居易是裴垍集团的重要成员。读《天可度》等诗，有助于我们对中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的了解。

白居易说《新乐府》是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”。从愿望说，这是善良的；从理论说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：在阶级对立的封建社会里，不存在既“为君”、“为臣”又“为民”、“为物”的超阶级的“仁政”。善良的愿望，使《新乐府》写得十分激动人心；理论的错误，则给创作带来了局限。

《新乐府》中有明显的“美”化唐朝皇帝的倾向。《城盐州》说“德宗按图自定计，非关将略与庙谋”，就不符合历史的真相。《牡丹芳》说“少回卿士爱花心，同似吾君忧稼穡”，更是为宪宗涂脂抹粉，而清高宗却认为白居易描写“元和天子忧农桑”一段是“正意”（《唐宋诗醇》）。《捕蝗》说：“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，以政驱蝗蝗出境。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，文皇仰天吞一蝗。一人有庆兆民赖，是岁虽蝗不为害。”这种见解，不仅今天看来是错误的，即与唐朝“姚崇之法”相比，也显得迂腐，而清高宗却认为：“诗意不主捕蝗，正以有向上一层在。”我们所认

为的《新乐府》中的不足之处，却是清高宗所欣赏的最佳之处，不正好反映出白诗的阶级性吗？

《新乐府》中猛烈抨击“害民”的“贪吏”、“蔽君”的“奸臣”，而尽量避免“刺”痛皇帝。《上阳白发人》渲染“怨旷”宫女之“苦”，旨在引起皇帝的怜悯之情，实行“仁政”。《杜陵叟》同情农民之“困”，但揭露的矛头只指向“急敛暴征”的“长吏”，宣扬皇帝之“心”是“惻隐”的。《缭绫》慨叹女工之“劳”，批评“昭阳舞人”不知爱惜，回避了皇帝的罪责。《上阳白发人》、《杜陵叟》、《缭绫》是五十首中写得较好的三首诗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局限。

从艺术形式方面来看，“比”与“兴”是我国古代文学写作的两种手法。“比”是譬喻，“兴”是寄托。由于“比”与“兴”往往难于区别，所以后来两个字被合成为一个词，白居易也是这样用的。他将“比兴”解释为“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，就是借此喻彼的意思。《新乐府》中对“比兴”手法的运用，变化多端，构思精巧。读者不仅要看到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，还要进一步看出白居易的寄托。

第一类 明显的，如：

《太行路》，小序指出“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”，诗中也点明“不独人间夫与妻，近代君臣亦如此”。白居易的命意，读者一眼看出。

第二类 隐寓的，如：

《黑龙潭》，小序指出“疾贪吏也”，但诗中没有明写贪吏，而是以“龙神”比皇帝，以“林鼠山狐”比贪吏，以“豚”比人民。诗的结语是“狐假龙神食豚尽，九重泉底龙知无？”虽未明写，读者能够领会白居易的寓意：贪吏已把民脂民膏吸尽了，高高在上的皇帝知不知呀？

第三类 由读者联想的，如：

《井底引银瓶》，诗的开头说：“井底引银瓶，银瓶欲上丝绳绝。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。”瓶、簪的“比兴”作用，在于引出封建社会的一幕爱情悲剧。诗中所反映的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，被负心男子“始乱终弃”而“悲羞归不得”的不幸遭遇。诗的结尾说：“寄言痴小人家女，慎勿将身轻许人”，即劝告妇女要慎重对待婚姻问题，不可轻率从事。正如小序所说“止淫奔也”（为封建礼法说教）。一般读者不认

为白居易别有寓意，而身遭滴戍的杨慎认为，此诗以“女不可轻于许人”比“士不可轻于从仕”（《升庵诗话》）。这个例子说明：《新乐府》中某些诗篇有无更多的寄托，随着读者的不同经验，可以产生各种联想。

顺便说一说，白居易运用“比兴”手法，有些地方借鉴于顾况而更为成功。顾况有一首《送别日晚歌》，周敬云：“此感君臣遇合之晚，记妇人望夫之辞以致慨也。”（《唐诗选脉会通》）唐汝询云：“此为妇人望夫之辞，以记君臣遇合之晚也。”（《唐诗解》）在我国封建社会里，“君为臣纲”，“夫为妻纲”，所以顾、白都借夫妻关系比君臣关系。顾况《送别日晚歌》云：“老不可兮更少”，是妻恐“色衰”而为夫所弃；白居易《太行路》云：“古称色衰相弃背，当时美人犹怨悔。何况如今鸾镜中，妾颜未改君心改”，是妻“色”尚未“衰”而已为夫所弃。白诗更加形容出君臣关系之难测。白诗借鉴于顾而比顾更为深刻。

白居易说《新乐府》“其辞质而径，欲见之者易谕也。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诫也。其事核而实，使采之者传信也。其体顺而肆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。”为了达到这四点要求，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。

诗歌的篇幅有限。白居易为了取得较好的效果，在有限的篇幅内，简化头绪，突出主题。即使写同一题材，也是每首各有侧重（例如：五十首诗中有几首是咏男女关系的，但《李夫人》是谏皇帝，《井底引银瓶》是劝女子，《古冢狐》是警告男子）。这样，可以集中描写，描写得细致深刻，使诗歌的形象格外鲜明。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·诗话》说：“乐天之诗，情致曲尽，入人肝脾。”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说：“乐天惟乐府曲中人心，历劫不朽。”可谓知言。

白居易充分利用民间的口语，尽量把《新乐府》写得通俗些。这样，容易读懂，便于记诵，可以掌握广大群众。赵翼赞美白居易用“口头语”，说“世徒以轻俗訾之，此不知诗者也”（《瓠北诗话》）。刘熙载指出：“常语易，奇语难，此诗之初关也。奇语易，常语难，此诗之重关也。香山用常得奇，此境良非易到。”（《艺概》）这些评论，是恰当的。

白居易虚心学习民间文学，将古体诗与民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形成了《新乐府》的特色：诗句长短参差，生动活泼，具有巨大的表

现力。在白居易的前辈诗人中，顾况比较重视民歌，从中汲取营养，以为创新的借鉴。顾况《李供奉弹箏篴歌》叠字双声以及三、五、七、十、十一字交叉运用的句式，开了白居易《新乐府》的先河。怎样将文人诗歌与民歌熔于一炉？顾况作了可贵的探索，经过白居易的努力，达到成熟的艺术境界。

白居易在新乐府诗的创作中，还注意诗歌的色彩美和音乐美。色彩上，白居易基本上用白描的笔法，勾勒出一幅幅唐代社会生活的图景，但其中也有工笔重彩，如《牡丹芳》就以绚丽的彩笔，渲染出牡丹的妖艳。音律上，白居易注意或平或仄，灵活换韵，五十首诗读来都有音乐感，和谐铿锵，抑扬顿挫，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。

向新的方向探索，不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白居易自己也认识到这点。他对元稹说过：“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。故理太周则辞繁，意太切则言激。然与足下为文，所长在于此，所病亦在于此。”（《和答诗十首》序）这一段话，是针对着包括《新乐府》在内的“讽谕诗”说的。白居易清醒地看到自己的“所长”与“所病”。白说《新乐府》“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诫也”，是指他的“所长”而言。诗话中批评元、白诗“太直”，则指其“病”。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。

综上所述，白居易远承《诗经》，近法杜甫，吸取汉、魏以来乐府诗的精华，转益多师，后来居上。他进行理论宣传，注意组织起来，成功地领导了新乐府运动。他所写的讽谕诗，反映民间疾苦，抨击黑暗现实，企图上达皇帝，改革弊政，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是有利于人民的，仍具有进步性。他的《新乐府》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，并传播到友好的邻邦。白居易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在我国诗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附记：建国以来，国内对白居易及其诗歌的研究，取得很大成绩。前辈如陈寅恪教授，友人如霍松林、苏渊雷等教授，均有专著，俱已再版，可见国内研究白诗气氛之浓厚。今撰此小文，对于相同的意见，说得较简，以免多占篇幅；对于可以补充的看法，说得稍详，以供青年同志们参考。

宋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

漆 侠

长期以来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宋朝是一个衰落的、腐败无能的皇朝。在同周边各族的交往中，它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：先挨契丹贵族、党项贵族的打，继又被女真贵族赶出了北中国，最后连偏安东南一隅也不可得，被蒙古贵族的牧骑踏得粉碎。因此，人们或是叹惋宋朝不武，已经失去了汉唐发皇兴旺的气象；或是认为宋朝是封建社会从盛到衰、从前期转向后期的转折点。

其实，这种看法仅是考察了宋朝的一个侧面，而且是一个不甚重要的侧面。只要作更进一步的考察，就会了解，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，居于当时世界文明的最前列，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

宋代经济的发展是极为突出的。先从农业生产说起。宋代人口超过了一亿，为汉唐的两倍；垦田约在七百万顷到七百五十万顷之间，也是汉唐的两倍，与明代相差不多。宋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的提高。它的单位面积产量，一般地亩产量约为二石，这在唐代已是高产了，而在两浙路太湖流域和江东路圩田地区，亩产量高达四五石到六七石，即使到明清时期的最高产量也不过如此。在宋代的稳产高产地区，一亩到一亩半地可以养活一个人，而在战国时期约六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。在种植业发展、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的决定性条件下，宋代蚕桑、果树、甘蔗、蔬菜、园艺(种花艺草)、林木、药物以及养鱼等业，都单独的发展起来，变成成为农业的分支或与农业并驾齐驱的一种行业了，而这些现象则是前代很少或者未曾见到的。多种经营、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，在满足了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，为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，从而推动了手工业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

展。还有，宋代经济除在南方广大地区继续发展之外，又向湘江西南地区推进，广南东路、广南西路有了较多的开发，个别地区也成为重要的生产区，这同样说明了宋代经济的广泛发展。

宋代官私手工业，同样取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。在前代生产的基础上，宋代采掘冶炼手工业，规模扩大了，技术改进了，产量成倍地或成若干倍地增加起来。其中铁的产量，据外国学者估计，年产量已达十四万吨，而这一数字是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、俄国远没有达到的。各类的船只制造，不但数量多，而且质量也好，到海外诸国进行贸易的大船，能够容纳六七百人和大量货物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，其中有的战舰可能在船头或甲板上装上一层铁甲，因而有“铁鹞”、“铁头”之称。丝织业更是突飞猛进，除传统的“蜀锦”、“东绢”之外，“婺罗”大量地投到市场上，并源源不绝地流到北方；产品质量普遍提高，从唐代的粗厚向细密轻薄方向发展；各地都有自己的名牌产品，刻丝、隔织、毫纱扬穀等等，就是其中著名的。富有创造性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当然不限于上述丝织业当中，在其他各手工业部门中也大量存在。正是在前所未有的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提高的广阔的基础上，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火药、罗盘和活字印刷术，都是在北宋一代发明的。而造纸技术在宋代也有了极大的改进，纸的原料多种多样，纸浆捣得极细，能制造出巨幅的雪白的纸张。手工业在各地区都有了广泛的发展，特别是在粮食供应充足、原料产量特多的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，手工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。手工业的发展，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耕具和其他产品，反转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商业、城市经济在手工业农业发达的情况下，也活跃起来。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，在两浙路，甚至把社会的最底层——佃户，也卷进商品市场，参与了这种交换活动。所有生产上的各种景象，充分地反映宋代社会这个有机体，有着一定的活力，而这一点在此前的唐代和此后的元代，都是不多见的。

我国封建社会生产的总趋势，用最简略的话来表述，是经历了两个马鞍形。从封建制度确立的战国时期，生产的发展显示了它比此前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优越性，中经秦汉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，到魏晋六